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 演进及其理论特征

赵磊 闫畅

[摘要] 国家安全是党治国理政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保障国泰民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国家安全思想是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有力武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在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其国家安全思想历经百年演变,实现了从维护单一要素安全向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拓展,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内改革发展稳定深层次矛盾凸显等现实问题。因此,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演进及其理论特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实现高水平安全、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国家安全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538(2025)04-0079-13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对“不安全”有着深刻的体会,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基因是内生的、自觉的。百年党史既是一部维护国家安全实践的历史,同样也是国家安全思想演进的历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党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环境,党对国家安全形势、任务及实现条件的判断呈现阶段性

与规律性特征,在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遭受严重侵害。彼时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主权国家的形态,国家安全更无从谈起,于是中国共产党将“没有独立的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安全”作为认识安全问题的逻辑起点。

[收稿日期] 2025-07-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22VRC047)。

[作者简介] 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闫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于此,党形成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核心的安全思想。

(一)没有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就没有国家

党在成立之初就意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对武装斗争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足,曾主动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1],更无法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科学论断,揭示掌握革命武装对于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党加强了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此后,毛泽东正确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与任务,提出并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主张,并通过游击战、持久战、运动战等战略战术思想指挥人民军队,实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2],更是从理论上阐明了掌握军队对于建立政权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武装斗争规律的认识,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坚强思想指引和坚实力量保障。

(二)建立统一战线,争取各方力量支持自身独立与解放

在革命初期,党的武装力量不强,理论尚不成熟,在组织路线和战略决策方面长期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首次公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指出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下,由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最早提出的,并逐步为全党接受^[3]。但这一战略并非机械照搬国际经验或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党在深入分析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退居次位的基础上,结合战争形势作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也是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一步。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运用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上。194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4]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联合美英苏等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获取军事援助、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争取日本国内反战人民,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力量,为赢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奋斗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

(三)开展土地革命,强化根据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根据地需要具备相对独立稳定的战略资源供给和稳固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5],强调经济能力是支持长期战争的根本保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深刻改变农村的阶级结构。广大农民实现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成为农村的主导力量、基层政权建设的参与者,极大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同时也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壮大了红军力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土地政策的调整,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了经济动员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构建起维护根据地安全的经济、社会根基。

(四)加强党的建设确保对革命的长期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一度出现右倾和

“左”倾错误以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痼疾,党的建设薄弱使错误路线难以及时纠正,严重损害革命事业。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将其称作“伟大的工程”^[6]。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战略意义,只有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才能“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7]。这一时期,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在组织建设上,党中央相继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为革命斗争提供了骨干力量。在极端的革命环境中,党不断走向成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得党能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建设确保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领导核心的稳固,为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分析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变化,一切从实际出发,明确中国革命各阶段的任务,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党的安全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其核心是以军事斗争谋取国家主权和独立,一切工作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展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以军事安全保障政权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其中心工作由武装夺取政权转为维护政权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使命和任务发生根本性改

变。自此,党开始从主权国家高度出发,以执政党的视角审视安全问题。这一时期,党聚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成以维护政权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强化军事能力建设,维护国土安全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内外安全形势严峻,党深刻认识到战争威胁的客观存在,将国土安全置于优先位置,国家安全目标逐步从夺取政权转向以军事安全保障政权安全。据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8],提出“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9]。在该思想的指导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战役等多场战争中取得胜利^[10],实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目标,有效维护了国土安全,为国内建设赢得相对平和的国际环境。此外,根据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开展“三线建设”,成功研制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安全利器,建立了国防工业体系和核战争战略防御体系,国家军事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二)构建反美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逐渐形成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保障社会主义中国在冷战背景下的生存。执政初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五十年代初,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进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拓展战略空间。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空前恶化,同时面对与美苏两大国的对抗格局,中国

共产党及时改变安全战略,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策略。随着局势的变化,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等战略构想,以斗争求团结,开辟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七十年代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奠定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的划分基于两条路径,一条以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线进行划分,另一条以国家发展水平为标准进行划分,预示着国家安全目标由单纯革命向革命与建设兼顾的转变。

(三)维护新生政权安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国家政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党的政治工作中心随之转向巩固新生政权、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立之初深入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围绕政权安全展开一系列斗争。一方面,通过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效稳固新生政权。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南方解放后,人民解放军首要任务之一是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开展清剿土匪的斗争。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打击了颠覆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的发展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外,毛泽东指出新生政权仍面临复杂的安全威胁,提出“发动战争与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两手”的论述^[11],并强调“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12],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政权安全问题。这一时期,虽然尚无对政治安全概念的明确界定,但已初步形成对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等政治安全总体要素的认知。

(四)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稳固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紧迫性逐渐凸显,毛泽东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

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军委上强调,把国防建设需要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未来战争的基本需要,又不过多占用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把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上。他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13];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14],点明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意义;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建设方针,强调只有基础工业坐得稳,农业和国防建设才能更有力。由于此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还不高,统筹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条件还不充足,因此只能将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制度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如果经济建设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巩固,“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5]。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五个五年计划的努力,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五)加强党的建设,以“赶考”的清醒牢记“两个务必”

党的执政地位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总开关,失去执政地位则安全无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推进党的建设。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身份的转变,二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对此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第一,要求党员干部具备更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并在1954年提出建立干部轮训制度,有效提升干部的理论素质。第二,执政条件下党拥有更多的权力,可能成为个别人

谋取私利的工具,作风建设十分紧迫。建国初期,党积极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于1950年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1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普遍整顿,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增强了党的纯洁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阐明,党的领导有力,国家安全就有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作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在政治报告中以专章论述“党的领导”问题,强调“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16]这一时期,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外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课题。这一时期,党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更加积极主动,形成了以维护政权安全为核心、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的传统安全观。其中,积极防御、塑造外部安全环境、加强经济建设等理念,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安全思想的发展厚植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财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经济安全的基础性作用

1978年12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主要工作从应对外部封锁,转变为推进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大规模战争不再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党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现了系列突破,特别是通过中美建交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形成了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丰富政治安全内涵,强调其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进入新时期,国家政治安全形势面临新的变化,对党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邓小平强调“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

放在第一位”^[17];在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及台湾问题上,江泽民始终强调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胡锦涛同样强调“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1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90年代末,港澳相继回归,对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具有重大意义。其次,重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1980年2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的问题,希望全党认真思考。从党的十二大开始,每一届党代会的报告都以专章论述和部署党的建设,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明确要求。最后,坚守制度安全,防范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邓小平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江泽民、胡锦涛也高度重视制度安全,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量的论述,同时承继、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从容应对敌对势力的侵扰。

(二)推动生产力革命,保障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

邓小平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义为“第二次革命”,他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20],改革开放的突出特征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据此,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特别强调生产力发达,提出了生产力革命的命题。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1],明确指出“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2],并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23]等重要论断。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社会发展稳定等带

来冲击与挑战,邓小平对此审慎判断,指出“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24],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25]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思想指导。这一时期,历次党代会都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召开多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工作^[26],不仅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有力保障了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此外,党还高度重视科技在生产力革命和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中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27]江泽民指出:“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28]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维护经济安全的实践更加主动,以开放合作助推自立自强。这一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重视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并强调各领域安全之间的关联性,极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内涵和外延。

(三)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化和平时期国家安全保障

这一时期,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新的判断,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29],指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和平。”^[30]据此,党的军事安全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由以往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思维,转向和平时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以专章阐述国防和军队建设;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命题,强调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31];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生存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32],对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当然这一时期的军事安全能力建设也是在克服困

难、创造条件的基础上艰难探索的。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33]强调“军队要忍耐”,是希望国防建设在特殊时期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为经济建设让渡资源,这一判断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是有战略意义的。但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中国清醒意识到只有和平善意而没有“杀手锏”仍意味着挨打。由此,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变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四)着力维护世界和平,参与国际安全环境塑造

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4],并将“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35]。中国积极推动与主要大国关系正常化,广泛加入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改善。苏联解体后,大国间意识形态对抗、军备竞赛趋于缓和,发展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但国际冲突依旧不断、安全形势依然复杂。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36],强调“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37]。新世纪初,党立足于对国内外形势的研判,首次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命题,并强调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和平、求共赢。据此,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理念,推动中国由国际安全事务的“旁观者”逐步转变为“贡献者”。例如,九十年代中国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04年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军事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统筹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通过自身发展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五)推动传统安全认知向非传统安全认知转变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瓦解,世界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非军事因素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对非传统安全议

题投入更多关注。1997年,江泽民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演讲,系统阐述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指出要“坚决抛弃冷战思维”^[38],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安全问题。同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进入新世纪,尤其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频繁出现,且影响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布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国与东盟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等重要文件,并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第一次将非传统安全概念纳入党代会报告。从理论演进的视角看,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内涵不断拓展的产物,是安全观念和实践不断丰富结果^[39],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理念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对抗走向合作的重要转向,因为全球性问题绝不是某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的。

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分析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党的国家安全思想实现由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的转变,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脉络日渐清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0]今天,“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风险综合体。”^[41]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刻洞察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道路问题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2021年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时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相统一。第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失去民心就意味着失去执政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42],深刻阐明了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实践中,党带领人民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打赢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以及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的安全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第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党中央提出了防范化解政治安全风险的命题^[43],明确将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以及党的建设都纳入其中。进入新时代,党将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摆在首要位置^[4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45],国家通过严厉打击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有效捍卫政权和制度安全。同时,党始终强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6]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47]。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民思想入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确保党不变质、红色江山不变色。

第三,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国家利益至上是实现人民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要求和原则。2025年5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坚守维护国家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明确提出国家安全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总体来说,“坚持三统一”这一原创性思想,既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本质特征,也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要求,通过科学统筹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保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通过三者的有效统一,不仅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更能够积极塑造国家安全,而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

(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经济安全的核心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不断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内外各种冲击与胁迫的能力^[48]。进入新时代,越来越需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9]经济安全包含的领域众多,要正确处理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等各领域安全问题^[50],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51]、“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52]等重要论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机构,不断提升应对风险的专业化能力。此外,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还要处理好自立自强同开放合作的辩证关系^[53]。党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强调“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54],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包括关税战、科技战、舆论战以及“长臂管辖”等。海外利

益安全同样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55],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保障海外利益安全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全球资源,补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在准确把握安全和发展辩证关系的前提下,坚持守正创新,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原则,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安全屏障。

(三)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坚实保障^[56]。具体而言,第一,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军事安全是守护国家安全的最后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先形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备战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要以备战打仗姿态破除和平积弊”^[57]、“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58]。第二,强化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部分将之前的军事文化社会“三大安全保障”,扩展为“四大安全保障”,即加入科技安全保障。一方面,突出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的极端迫切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充分强调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59]。第三,文化关乎国本、国运^[60],是国家安全博弈的重要阵地。文化安全既关系到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也直接影

响国家凝聚力乃至国家安全全局。只有对内坚持文化自信,坚守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对外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在扩大开放中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免疫力,有效防范外来文化冲击与渗透。第四,社会安全是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晴雨表,是社会安定的风向标。很长一段时期,党代会报告将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置于社会管理、治理相关章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单独成章,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被纳入维护国家安全的框架下,这一变化凸显了社会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兜底保障作用。总体来看,传统安全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和重点,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二者之间的联动与转化日益加强,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向全面、协调、综合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系统工程。

(四)以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6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62]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均明确强调中国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立足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党处理国际安全事务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目前该倡议已经得到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赞赏,转化为123份双多边合作文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扩员,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斡旋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持续为地区和平与发展注入稳定力量。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有效

对冲西方盟友体系带来的外部安全压力。2025年5月30日,国际调解院公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法治类公共产品。

十多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下,党深入研判国家安全形势变化,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握国家安全实质,牢牢掌握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自主、全局性主动,探索形成了科学完备的国家安全思想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成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五、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特征

回顾百年党史,党对国家安全认识始于山河破碎的强烈“不安全感”,逐步延伸到从集中精力解决某一重点领域安全到全面统筹各领域安全的整体认知上,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丰富的国家安全实践。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演进,形成了对国家安全的规律性认识,展现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特征。

(一)本体论: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

“安全是什么”以及“谁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理论本体论中的核心问题,其取向受到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不同安全思想流派的本体论具有明显差异,甚至具有阶级差异。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脱胎并形成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安全始终是一切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没有人民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与西方政党从选民利益和资本利益出发开展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具有本质性差异^[63],反映二者截然

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和阶级立场。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主张“安全即话语”,将安全理解为“主体间性”的社会建构,通过话语将特定议题标签化为“安全威胁”,从而为政府扩张权力提供正当性^[64]。其理论实质上是将国家安全工具化,使安全议题成为权力博弈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将安全视作一种价值,旨在保障个人、群体和国家实现其预期目标与整体利益^[65],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种价值取向的核心在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唯有夯实人民安全的根基,才能筑牢政治安全的防线。

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坚持人民是国家安全的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66]。西方传统安全研究以国家主义为本体论,认为“主权等于国家安全”,即只要建立主权国家,国家内部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军事层面^[67]。这一理论路径将国家视为安全仅有的主体,忽视了国家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存在明显的局限。对此,威尔士学派提出批判,认为国家主义既非良好生活的前提,也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唯一路径,反而可能成为不安全的来源^[68]。该学派进一步提出了“人的解放”等概念,强调“人的安全”应成为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核心^[69],推动安全议题从国家层面延伸到个体层面。然而,在对国家安全主体的认知上,无论是坚持国家主义,还是强调个体主义,都是片面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群众、血脉在人民群众、力量在人民群众,始终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相统一,将人的安全、人民安全与人类安全相统一,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人民性,超越了西方安全理论将个体同集体以及人民同国家简单二元对立的做法。

(二)认识论: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

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决定了不同的认识论方法和路径。美国学派往往从军事战略出发,强调外

部“他者”对本国安全的挑战,侧重对历史经验进行因果关系归纳,体现出典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特征。欧洲学派则借助社会学理论,将文化、观念、规范等因素纳入安全研究,呈现出观念主义认识论的特征。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在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进程中统筹考量国家安全问题。

抗战初期,面对敌强我弱、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局面,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演变规律,通过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系统划分战争发展阶段,指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此后,无论是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还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均通过对国际国内环境、战争发展趋势、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民意基础等因素的全面分析,判断安全挑战和应对策略,牢牢把握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主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面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国家安全环境十分严峻^[70]。1969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在中央领导部署下,撰写《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为党中央作出以改善中美关系赢得安全主动的重大决策提供认知论依据。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强调“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71]。基于此,党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维护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认识非常体现价值观和阶级立场差异。美西方的国家安全目标以维持霸权为导向,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认为自身安全就是国际安全,甚至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上。然而,从理论上讲,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容易导致安全泛化,引发更深层次甚至结构性的不安全。中国共产党强调“相对安全”,主张安全是一种“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

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72]恰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3],世界共同安全是每一个国家实现安全的条件。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强调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

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演进深刻表明,党通过对国际安全环境、具体安全问题、维护安全能力的系统分析,科学研判安全形势、分阶段部署任务,深入回答了“怎样认识安全”等深层次问题,在应对各类安全风险挑战中保持了战略主动。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超越了西方安全理论中经验主义、观念主义以及绝对安全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认识论。

(三)实践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的实现不仅依赖思想和理论的创新,还取决于安全体系的构建和能力水平的跃升。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认为,国家安全是安全状态与安全能力的有机统一,在深刻认识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把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支撑。从最初将国家安全等于军事安全、国土安全,到今天全面推进各领域安全,迄今为止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主阵地主战场不断拓展,已经涵盖20个重点领域。

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形成体系性合力和战斗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体制;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正式颁布实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2021年11月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明确了五年内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

推动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要求在各重点领域同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筹协调,善于“弹钢琴”,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切实提升国家安全治理的整体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党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提升,国家安全的工具箱更加丰富、适配。在重点安全领域,深入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强化能源多元供应,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强化国际战略通道和关键节点安全,保障初级产品供应安全;建立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推动《金融稳定法》《人工智能法》等立法进程;重视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稳定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综合来看,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还兼具强烈的理论自觉,在厘清本体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基础上,展现出鲜明的理论特征,即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统一、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相统一。这一思想体系不仅科学回应了如何解决好大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也为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特殊安全挑战提供了有力指导;它超越了传统安全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有益参考,推动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809.
-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G].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89.
- [3]蒋建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3(12).

- [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G].人民出版社,1991:806,1024.
- [6][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G].人民出版社,1991:602,614.
- [8][9][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G].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86,103.
- [10]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J].现代国际关系,2021(3).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139.
- [12][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G].人民出版社,1991:1427,1243.
- [14][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G].人民出版社,1999:27,89.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G].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53.
- [17][20][22][23][24][25][29][30][33][34][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G].人民出版社,1993:347,135,225,265,135,378,249,104,128,210,116.
- [18]胡锦涛.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不断提高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能力[N].人民日报,2010-03-13.
- [19][21][2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G].人民出版社,1994:333,311,86.
- [2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人民出版社,2021:18.
- [28]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1.
- [31]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32.
- [3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12:41.
- [3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G].人民出版社,2006:520.
- [3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G].人民出版社,2006:396,313.
- [38]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演讲[N].人民日报,1997-04-24.
- [39]Barrie Paskins. Security in a New Age? [M]// New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London: Brassey's, 1993: 17-35.
- [40][45][46][5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24,106,154.
- [41][4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35,25.
- [4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1:11.
- [44][50][53][56][57][61]赵磊.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113,119,121,125,126,137.
- [47][4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人民出版社,2022:43,28.
- [48][5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237-238,247.
- [5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M].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113.
- [52]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G].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87.
- [54]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4:10.
- [55]习近平.坚定战略自信 勇于担当作为 全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12-03.
- [6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23:1.
-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外文出版社,2014:265.
- [63]Bawn, Kathleen, et al.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Groups, Policy Demands and Nomin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2,10(3):572.
- [64]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M]//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42-64.
- [65]Charles Herman. Are the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Changing[J]. Mershon Centre Quarterly Report,1977,3(1):5.
- [6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M].人民出版社,2017:21.

[67]戴长征,毛闰铎.从安全困境、发展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代国家安全理念的变迁与超越[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

[68]Richard Wyn Jones. 'Message in a Bottle'? Theory and Praxis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J].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1995,16(3):299-319;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hange[M].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95-100.

[69]Booth, Ken.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17(4):313-327.

[7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外文出版社,2017:82.

[72]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15:16.

[7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人民出版社,2014:51.

(责任编辑 吕红娟)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Zhao Lei, Yan Chang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is a crucial part in the Party's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a very important task in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ideology is a powerful weapon for guiding the practice of national securi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the practice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national security ideology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realizing the expansion from focusing on the security of a single element to safeguarding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ming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acing such realities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the complexity and change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highlighting of deep-rooted contradictions in domest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Therefore, an in-depth grasp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national security thinking and its theoretical features, and the unswerving implementation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high level of security and the escort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Ideology, National Security Theory,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